第41卷 第5期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ol.41, No.5
2004年9月 Journal of Peking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Sep. 2004

从学科史回顾八十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

温儒敏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 从学科史的角度,回顾梳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倾向,认为大致经历了"重评"与学科复苏、思潮流派研究的流行、理论方法热、文学史整体观提出以及学科格局的调整等几个阶段。文章评述各个阶段代表性的研究论作,注意到学术"生产"变迁各个环节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引起变化的精神文化动因。

关键词: 现代文学; 学科史; 文学史; 20世纪80年代; 学术生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5-0083-09

尽管后来人们对上世纪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满与批评,但这是一个学科自觉的时期,对许多涉足其中的学者来说,又是难于忘却的富于理想、自信和激情的时期。时代突变带来的那种"精神松绑"的快感,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事业心,以及对久违了的学术的向往与尊崇,都在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上得到了痛快淋漓的表现。

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文革"刚刚过去,最重要的是为"文革"中被批判被打倒的一批作家平反,即所谓"拨乱反正"时期,学科的复元因为贴近现实而大受社会的关注;第二阶段是1983年前后,强调"历史和美学的结合",试图重建现代文学学科,除了竭力发掘文学史上被忽略的作家,最大的关心就是"填补空白"和梳理思潮流派脉络;第三阶段是80年代中期,回归"五四"和强调启蒙主义立场使现代文学研究更加超越意识形态的制约,而这一段热衷于了解和运用外来的文学理论与方法,又出现所谓"方法热"和"文化热";第四阶段是80年代后期,收获了一批比较坚实的成果,也普遍意识到现代文学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学科的分期、格局的讨论,以及文学史研究整体观的提出,表明学科进入自觉调整的时期。以上只是非常粗略的划分,各个阶段的文学现象可能互相衔接叠合,我们只能大致依照时序,从学科发展各个阶段举出某些重要的现象和论著来评说,以获得一种轮廓式的学术史了解。

一、"重评"与学科的复苏

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报刊上最频繁出现的一个词是"拨乱反正",当时这个"乱"指的是"文革"十年动乱,是对百业的摧毁与扰乱,"文革"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批判和清除流毒,正本清源,复兴百业。对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来说,这也是非常迫切而且实际的事情,而且比起其他相关学科来,现代文学因为受"文革"的摧残更严重,"拨乱反正"也有更强的内驱力和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作为一门学科,现代文学和政治的关联是与生俱来的。一方面,现实政治的需要的确也给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带来动力,甚至使这样一门小学科成为有很高的社会显示度的学科;另一方面,政治又不时制约和干扰学科的发展。50年代以后,学科一次又一次被卷进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一批又一批作家被批判革除,真的成了所谓"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了。到了"文革"期间,终于陷入绝境,几乎可以说是"全面解体"。所以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在80年代又不能不和政治紧密相连,或者说,更多的是在依恃大的政治环境的转变。伴随政治

收稿日期:2004-08-20

作者简介:温儒敏(1946—),男,广东紫金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变革而形成的各种理论、观念和思潮,都曾经作为某种资源,为现代文学学科的重建助过一臂之力。现代文学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乎成为一门有社会影响力的"显学",是时代变迁以及学科本身性质所决定的。学科史应当重视这次"显学"现象。

1977年冬,北京大学中文系联合一些高校举办关于"两个口号"论争以及"三十年代文艺"等问题的讨论会,随之在兰州、厦门等地又召开数次讨论会,都是围绕"文革"中被批判的一些重大的文学史现象开展研讨,力图澄清一些史实,为那些被"四人帮"当作靶子批判的所谓"文艺黑线"和相关的人物说些公道话,显然带有"平反"与"重评"的性质。现在看来,这样的讨论似乎"层次"不高,政治性远远大于学术性,但要看到,那时"文革"刚刚结束,思想解放运动尚未全面推开,所讨论的这些问题在当时仍然是敏感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引起文艺界和社会上很大的反响。

接着一些学校教员着手收集现代作家的传记材料,编写现代作家辞典。1978年徐州师院的老师邀请70多位健在的作家撰写自传,同时收集已故作家的自传,汇编成《中国现代作家传略》2册印行,其中不少是文革中被打成"黑帮"的作家。同一年,北京语言学院的教员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家辞典》的"现代第一分册"选录有现代作家405人,翌年出版"第二分册",又选录现代作家582人(第三、四分册又收录1195位现代作家词条),自"五四"以来各个阶段有过一定影响的作家、包括当时仍然可能有争议的作家,几乎都入选其中了。这些"传略"和"辞典"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让作家平反亮相的作用,而且及时为教学研究提供了非常短缺的资料,虽然未正式出版,(辞典的第一、二册"内部发行",印数可观;第三、四册1985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但影响极大,当时从事现代文学教学的学者几乎人手一册。与此同时,报刊上有大量关于消失多年的作家的报道,也陆续发表为"文革"中受批判的作家平反昭雪的评论文章。这种"平反"式的论作,虽然没有摆脱二元对立式的政治判断的思维框架,所谓"反正"在当时也主要是回到50年代的观念体系框架,接续被"文革"中断了的工作,但这一切对"复活"现代文学这门学科是必要的一步。此后一直到80年代初期,"平反"或者"重新评价"仍然是许多现代文学学者普遍的研究形态,因为刚刚复苏的社会需要这种贴近现实的研究。

这里还要提到两件与现代文学学科的"复活"密切关联的事情,即1977年恢复高考以及1978年首届研究生的招生。"文革"中断正规的高等教育达十年之久,使得人才断档,七七、七八两届许多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考生空前踊跃,简直是百里挑一。而在中文系所属的几个学科里边,大概因为现代文学比较贴近现实,比较热门,也可能相对容易备考,报考这方面研究生的人数又特别多,各校都招收了一批富于才干与生活历练的学生。这几届本科生、研究生上学时刚好处在学科重建阶段,师生几乎都是"从头来",大家一边教,一边学,一边探索,一边出成果,真是教学相长。后来这几届本科生、研究生中的一些人就成为现代文学学科建设中很有特点的学者。总结现代文学研究历史时可以适当关注七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学者的"整体特征",以及他们在学科重建中起到的结构性的作用。

和建国初期学科形成的情形有些类似,这一次又是大学的教学直接成为现代文学学科重建的动力。学生招进来了,要上课了,教材就是首要的问题。于是学科重建首先是教材重写,在短时间内出现了现代文学的"编教材热"现象。1978年,为满足全国大学的教学需要,唐弢主持编写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重新组织编写组,先后集中了严家炎、樊骏、陈涌等一批权威的学者参加编写。[①] 1979年6月该书第一册问世,为"文革"后正式出版的最早的一部现代文学史教材,接着第二、三册分别于1979年11月和1980年12月出版。与此同时,全国多所大学也纷纷联合编写现代文学史教材。比较著名的有1979年出版的九院校编写组(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安徽师大、南京师院、扬州师院、徐州师院、延边大学和

① 这套教材是1961年文科教材会议之后,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国家统编教材,先后有唐弢(主编)、王瑶、刘绶松、刘泮溪、严家炎、樊骏、路坎等数十位专家参加,1964年完成讨论稿,未出版。1978年9月重建编写组,又增添了陈涌等成员,严家炎协助唐弢全面负责该书第一、二册的修订和第三册的编写。1979年6月第一册出版,接着第二、三册分别于1979年11月和1980年12月出版。

安徽大学)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田仲济和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及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1978至1981年间,还有其他多种合作编写的现代文学史出版。这些现代文学史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试图突破五六十年代同类教材的局限,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给予以往未得到公正评价的作家以比较客观的评价,但基本格局未变,"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是文学史叙事的中轴,政治评价仍然是基本标准。有人说这是"虽展新姿,仍存旧痕"①。这不只是"唐弢本"等几种教材,也可以移用来说明这个历史转折期的文学史写作的特征。

从学科史角度来看,这一阶段的教科书的集中编写也是值得注意的现象。一切事物都是作为过程展开的。在"文革"刚过去,"拨乱反正"成为普遍的社会心态的时期,编教材是要重新解释被误解和颠倒了的历史,文学史家们坚定地认为他们完全可以客观地做到这一点,并且相信这项工作对青年和社会的影响会十分重大。许多编教材的学者怀着那样虔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参与编写工作。"教材热"主要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后来常见的职称评定、成果量化、经济利益等因素还很少掺乎到写作中来。当时政治评价仍然作为最主要的评价标准,但许多政治问题又未曾解决,如胡风问题、建国后多次文艺运动评价问题,等等,都还不明朗,有些问题是不可能单靠学者的探究来解决的,何况文艺为政治服务仍然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在必要的基础性的专题研究还未能充分展开之时,现代文学教材的编写是很难摆脱以论带史的"旧痕"的。

现代文学的学科重建再一次以教材的写作作为最重要的方式。现在许多教材都更新了,前面提到的几种曾经影响巨大的教材,现在看来都"过时"了。但我们不应当忽视这一段教材集中编写的现象,以及作为当时有代表性的写作心态与文学史思维方式。此外,还应当特别注意,像唐弢和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到90年代初,仍然是被广泛采用的教材,其对文学史阐释的框架、方法、学风乃至许多基本结论,对全国的现代文学史的教学都有巨大的覆盖性的影响。以前已经有学者分析过"唐弢本"文学史的得失,如黄修己就指出:"与那些短时期内急速编就的教材不同,唐弢本拖延了十几个年头,像棵老树一样,既有粗壮的老干,也有娇嫩的新枝,身上打着一圈一圈的年轮,记录着不同时间学术上的风云变幻。正因如此,它出版后,既成为新文学史著中水平最高之一部,又让人觉得新鲜感不足。人们一面尊它为权威性的著作,一面也多少有点惋惜的感慨。但无论如何,它是前三十年的一部总结之作,它的成就代表了前三十年的水平,它的不足也反映了前三十年的局限。"[1](P205-205)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现在重读"唐本"文学史,尽管我们已经不习惯其论史的框架和许多结论,但依然会对这些前辈治学的大气、专注和坚实深感敬佩。如果能把"唐弢本"和80年代初期一些代表性的文学史教材的写作作为一种与时代密切关联的现象来考察,探讨其生成的肌理,也许是个有学术含量的课题。

我们还是回到1979年。当时的文学史家除了用心编教材,还有一件事就是努力营造相对自由活跃的学术环境。这时,思想解放的潮流已经涌动,知识分子在批判和力图摒弃思想专制的同时,诚挚而热情地呼唤着可以自由表达的舆论空间。这毫无疑问是大胆的尝试。一时间各种自发的刊物、论坛和学会如雨后春笋涌现。尽管许多活动仍然要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但毕竟有了更多的个人发表的机会。这种情况在五六十年代是不可想象的,自然也就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生长提供了空前良好的土壤。关于思想解放潮流对现代文学的学术发展所起的巨大的推进作用,仍然是学科史未能充分注意的课题。

1979年的1月,在教育部召开的一次教材审稿会上,与会代表倡议成立全国高校现代文学研究会,并组成筹委会,选举王瑶先生任会长,田仲济、任访秋先生任副会长,随后又在西安召开的教

① 邢铁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文学评论》1983年第6期)中有"一方面展现出新姿,一方面又残存着旧痕"两句,评论"九院校"本文学史。后来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1995年出版)用"虽展新姿,仍有旧痕"作为第八章的标题。

材会议上推选第一届学会理事。[①] 1980年7月在包头召开学会的首届学术讨论会,学会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学会。这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恢复现代文学本来的历史面目,提高教学与研究的水平。此后,学会定期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以学术专题讨论为主的理事会,以及其他形式的学术会议。把学会的每一阶段的学术活动串连起来,考察其在不同时期的核心话题与争议焦点,等等,也就能大致看出这二十多年来现代文学学科嬗变的轨迹。学会的成立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学术空间的形成,在学术生产上是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的。学会不但为研究者提供讨论和发表的机会,而且在学术发展中起到某种导向的作用。

与此同时,学会决定创办学术刊物《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年10月该刊的创刊号正式出版,主编王瑶在发刊词"致读者"中强调,必须改变"过去对现代文学的各种复杂成分注意很少,研究很不够"的状况,希望"不仅要注意研究文学运动、文学斗争,还要注意研究文学思潮和创作流派;不仅要注意有代表性的大作家的研究,还要注意其他作家的研究;不仅要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还要研究民主主义作家,对于历来认为是反面的作家作品也要注意研究剖析;不仅要考察作品的思想内容,还要注意作品艺术形式、风格的研究"。这话说得很全面,其实新意在于"不仅"后面的"还要"。"还要"就是强调重新发现与公正评价以往忽略或者遮蔽了的那一部分。这个宗旨在刊物的选稿中得于贯彻。或者说,80年代初的现代文学研究强调思想解放,偏重"重新评价",这个总体特征被鲜明地体现到这份刊物中了。该刊的创刊号就把胡适作为文学革命的开拓者来讨论[②],第2、3辑又讨论"充满矛盾而易招误解的作家"郁达夫和徐志摩,[③] 都带有"重新评价"的性质。随后对于许多此前被批判、被忽略的作家,或者被误解、被颠倒了的文学史现象,都逐步铺开讨论。这类讨论不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进行,其他文学评论刊物,如《新文学论丛》、《文学评论》,《文艺论丛》、《新文学史料》,以及各种学报,等等,都参与到"重评"中来。列入"重评"的作家非常广泛,如周作人、沈从文、戴望舒、丁玲、冯雪峰、瞿秋白、胡风、路翎、萧军、废名、朱湘、李金发、施蛰存、师陀、李劼人、张爱玲等等作家,以及新月派、鸳鸯蝴蝶派、论语派、初期象征诗派,30年代关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等等,都有专门的研究论文进行"重评"或反思。

应当提到的是,这时一些海外汉学家的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也渐次介绍进来,他们不同的文学史观和研究角度,让封闭已久的国内学者感到新鲜,即使不会完全赞同,也可能有所启迪。如美国汉学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大陆没有公开出版,但不少学者和研究生都通过英文版或者辗转传阅的台湾中译本了解到这本书,客观上也带动了对于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等一批作家的重新发现。

"平反"也好,"重新评价"也好,"填补空白"也好,在当时都带有某些政治上"落实政策"的意味,研究者自觉不自觉都还是要从政治角度伸张包容性,或者尽量把评论对象往"民主主义"阵线上归类,或者努力发掘辨析其可能具有某些"反帝反封建"性质,以此求得重新进入文学史的合法性。这个时期的社会生活仍然是那样政治化,但政治"标准"在研究者这里已经变得宽松灵活,只不过他们的视野一时还不够开阔,即使艺术上的"平反"也仍然不能脱离既定的政治评判框架。打从五六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政治制约越来越紧,作家作品入史的范围越来越窄,以致到了"文革"时期登峰造极,几乎所有有影响的作家都被贬斥为"黑线人物"或者"封资修"垃圾,结果文坛萧瑟,人们戏称那时就"只剩下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如果循着历史发展的链条来考察,那么对于80年代初以研究对象的拓展为特点的"重评"和"填补空白",就会有更多的历史的理解,并能充分发现这些成果的学科史价值。

了解这一段学科发展的状况,除了参考相关的学术述评,最好能翻阅一些代表性的期刊。如前面屡有提到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从

① 据《高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报导,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创刊号,北京出版社1979年出版。
② 耿云志的文章《胡适与文学革命运动》。
③ 发表于第2辑的《一个充满矛盾而易招误解的作家》(朱靖华),发表于第3辑的《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温儒敏)和《评徐志摩的诗》(陆耀东)等文。

1979年创刊至今,已经连续出版25年,作为一种比较持重的学术刊物,能坚持下来真是不容易。《丛刊》是专门刊登现代文学研究成果的刊物,它所发表的文章,大约占这门学科每年研究成果(不包括单行本著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如果要了解现代文学学科的历史演变,特别是80年代以来研究的进展状况,《丛刊》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参考文献。著名的文学史家樊骏先生在《丛刊》出版10年和20年时,都曾经撰写长文总结,这也是学科史的重要研究成果。① 当然,其他一些在七八十年代复刊或创刊、经常有现代文学研究成果发表的刊物,如《新文学史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文学评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主办)、《新文学论丛》(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文艺论丛》(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以及《鲁迅研究文丛》(湖南人民出版社主办)、《鲁迅研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办),《鲁迅学刊》(辽宁社科院主办),等等,也都记录了当时文学研究趋向与风气的变化,是应当进入学术史考察视野的。

二、思潮流派的研究风气

对现代文学作家作品的"重评"高潮持续的时间较长,后来北京、上海一些报刊举办"名著重读"、"名作欣赏"之类栏目,也是一种"重评"的延续。关于作家研究的许多专题讨论会陆续召开,甚至还出现了相关的专题性学会组织,如鲁迅学会、郭沫若研究会、茅盾研究会、丁玲研究会、瞿秋白研究会,等等。这都表明以"重评"开始的专题研究日渐深入,学者们纷纷找到自己擅长的某个领域,分工也似乎细了。在80年代前期,每年发表关于现代文学的研究文章平均都有上千篇,其中作家作品的评论大致占到一半(其余多为史料和回忆录等等),数量是相当大的。不过到了1982年前后,人们显然不再满足于政治框架内的"重评",而且"填补空白"也真不少了,大家很自然都希望突破一般的作家作品论,由点及面,把文学发展的脉络理出来,进入更重视"文学史规律"的研究层次,这样,就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把目光转向文学思潮流派,转向对文学现象和问题的综合比较研究。1981年4月和1983年1月,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先后召开两次学术会议,议题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问题"。参与这两次会议的大都是当时比较著名的学者,而且都做了有相当的准备的论文或者发言,后来结集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②。从这些论文和发言看,研究者对文学思潮的兴趣不再停留于对文学论争、事件的辨析,而开始关注现代文学与传统的关系以及外来影响这样一些深层次的课题。诸如《中国现代文学和民族传统的关系》(王瑶)、《关于国际革命文艺运动》(陈冰夷)、《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刘柏青)、《试论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现代话剧发展之影响》(田本相),等等,就很重视对现代文学各种潮流的兴发做溯源的分析。而且研究者也开始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联系"角度考察不同的文学派别。如《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严家炎)、《关于山药蛋派》(高捷)、《漫谈白洋淀派》(冯健男)、《简论鸳鸯蝴蝶派》(刘扬体),等等,都力图在"发掘"与论证流派的存在价值。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实际起到了倡导的作用,而且开启了新的研究思维范式:对个别文学现象以及对作家作品的就事论事的分析评价,转向在更大的文化背景中,对作家作品赖于产生的各种因素和历史关系做综合的分析;对各种复杂的思潮的关注,超越了以往对文学论争的简单化的政治性评判,现代文学发展的肌理得以初步呈现;所谓主流、支流的习惯性说法遭到质疑,多样的流派研究开始复原现代文坛多彩的面貌,并宣示了许多作家原来被遮蔽的某些特色与贡献。稍后,关于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思潮的关联,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等各种思潮的流变,以及创造社、新月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七月"诗派、抗战文学运动、东北作家群,等等,成为众多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用心投入的新的研究领域。这种关注的目光的转移,超越了以往"现实主义独尊"的叙史模式,拓宽了研究领域,为学科的复兴探索了多种可能性。

"影响研究"成为这一段现代文学研究中常见

① 樊骏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十年:1979—1989》,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2期;《丛刊:又一个十年(1989—1999)》,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2、4期。

② 《中国现代文学思潮流派讨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出版。

的切入点。这种学术理路的展开也得益于当时方兴未艾的比较文学。这门擅长科际整合的学科方法打开了现代文学研究者新的视野,激发了他们涉足文学思潮研究、并使这种研究尽可能"面向世界"的热情。当时一本论述现代作家如何受到外国文学影响的论文集《走向世界文学》,集合了许多年轻的学术新秀来讨论这个热门的话题,一时几乎成为畅销书。① 这本书名题为"走向世界",曾经引起某些批评。② 难道我们不就在世界之中?但这"走向世界"可以解读为一种对于"现代化"的渴求:文学史家们是越来越看重以"现代化"的企求作为解释文学发展的坐标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文学思潮流变和外来影响研究因其丰富的学术含量可供阐发,成为许多博士论文的选题,大家不约而同都在把"与世界文学接轨"作为新的研究的参照系。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80 年代前期兴发的思潮流派研究风尚,实际上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在"重评"之后就是更宽容、更有历史感,也更具综合性、学理性的探求。事实上,肇始于 80 年代初的思潮流派研究热虽然一时少有出色的产品,但这种风气拓展了许多学者的眼光,甚至奠定了许多学者治学的格局,他们扎扎实实地下功夫,在几年之内就陆续贡献出一批结实的成果。如严家炎关于新感觉派和其他小说流派的研究,乐黛云关于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孙玉石关于初期象征诗派的研究,温儒敏关于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的研究,王富仁与罗钢关于创造社与浪漫主义美学关系的研究,罗成琰关于现代文学中浪漫主义的研究,范伯群关于鸳鸯蝴蝶派的研究,艾晓明关于左翼文学思潮的研究,等等。

三、理论方法热

到了 80 年代中期,学术界的空气相对自由活跃,这都有赖于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突破惯性思维的束缚是来得那样突然并且时髦,往昔不太敢触及的话题,如重视文学的人性表达价值和审美价值,重视作家个性化的创造,以及提倡"主体性"和文学人物塑造的"性格组合论"等等,都无须顾忌可以在会议上和报刊上放言探讨了。特别是回归五四以及强调启蒙主义立场,一时成为许多研究者的共同追求。哲学家李泽厚关于"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在文学界产生了辐射性的影响。人们似乎都相信只要回到文学,回到个体,回到审美,就会进入胜景,别有洞天。这种多少带有天真气象的普遍精神企求是前所未有的,的确让人兴奋。与此相关,是各种西方文艺理论方法的大举引进。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理论与方法、萨特的存在主义、系统论、结构主义、新批评、叙事学、接受美学、女性主义和各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理论,一波一波地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引起反响,炫耀式的模仿运用本身往往就是目的,成为一种时髦。那时的文科学生很少没有读过弗洛伊德或者萨特的,理论方法的"升温"造成某种焦灼的空气,的确也给许多年轻的学者带来学术的灵感与冲动。

也许就是外来文化的冲击使我们返观自己学术上的缺陷,在 80 年代中期,许多研究者发现自己底气的不足,不约而同都对理论方法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有不少文章都在讨论如何冲破僵化的文学史思维与评论模式,③ 学者们不只是考虑如何提升自己研究的理论能力,更重要的是呼唤文学史思维空间的拓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这种理论创新的渴求在更年轻的一代(主要是 1985 年前后刚刚研究生毕业或者仍然在读的青年)学者中表现更为强烈,因为理论可以更快"出活",理论可以支撑他们短促突破。

毋庸讳言,西方文学批评理论方法的冲击波的确带来新的学术气象。这里必须提到 1984 年 2 月林兴宅发表的《论阿 Q 性格系统》。该文大胆

① 《走向世界文学》是有关"中国现代作家与外国文学"关系研究的论文集,曾小逸编,1985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数达 9000 册。收有 30 篇论文,探讨了 30 位现代作家所受外国文学的影响。论文作者大都是当时初出茅庐的研究生,如王富仁、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杨义、朱栋霖、许子东、凌宇、吴福辉、王晓明、赵园、刘纳、蓝棣之、孙乃修、陈圣生、王文英、方锡德,等等,可谓一时之选,后来大都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生力军。

② 如卞之琳在 1986 年 6 月 4 日《文艺报》发文《有来有往》,指出《走向世界文学》一书既显示了研究实力,又明显暴露了不足,包括外文修养的缺陷,连封面上的书名英文"To The World Literature"都翻译错误。

③ 如刘再复《研究个性的追求与思维成果的吸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 年第 2 期),殷国明《应当冲破僵化的、封闭的文学批评方法模式》(《文学评论》1985 年第 3 期),汪应果、朱栋霖《理论的发展在于自我扬弃》(《文学评论》1985 年第 4 期)。

起用系统论和心理学方法来阐释阿 Q 性格,从所谓自然质、功能质、系统质等不同层面探讨阿 Q 典型的特质、阿 Q 主义的来源及其超越阶级、时代、民族的普遍性等历来有争议的问题,多角度展示了阿 Q 性格的内涵。[2]现在读这篇多少有些机械模仿的文章大概不会引起什么惊讶,但该文当年发表后的反应却是异乎寻常的。多年众说纷纭争议不休的难题好像用新方法这么一试,快刀斩乱麻就"解决"了。事实上这篇文章及其反响在学科史上已经具有标志性质:在 80 年代中期,像林兴宅这样怀着借用新术打破旧说的兴奋、大胆尝试各种西方理论的作者不是少数,他们的努力起码在气势上突破了简单化的思维束缚,并以此确立了自己前所未有的学术自信。特别是在小说、戏剧的评论方面,1985 年之后出现了争相使用心理分析、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叙事学方法进行研究的一批论作。虽然难免常常见到那种生硬套用的弊病,但也出现一些能巧妙吸取而又富于创意的成果。如黄子平关于小说主题类型的研究①,孟悦对现代文学叙事角度的发掘考察②,余凤高关于现代小说的"心理分析"③,还有陈平原在小说史研究中的叙事学理论运用④,等等,都比较善于将外来的理论方法加以简化处理,变得有可操作性,从而在研究的角度和理路上别开生面,活跃了学界的空气。

外来理论方法的影响下形成的另一现象是"文化热"。在 80 年代中期,一方面许多人还在呼吁"回到文学本身",另一方面又有一些人开始埋怨现代文学学科"人多地少",太拥挤,埋头发掘"文学性"似乎没有很多资源,不如破关而出,拓展其他领域。于是我们看到有许多文章试图转向以往研究中比较陌生的文化分析。但从学科史意义上我们更乐意把这场"文化热"解读为一种精神突围,而不是简单的扩大地盘:文学史家们要突破长久以来过于政治化的学术格局,从不同侧面充分发掘现代文学的丰富潜质,寻求新的学科生长点。文化研究容易被人指责为空泛,目前这种情况还是存在的;但在 80 年代,研究者刚刚在尝试这种方法,一般都还扣着文学来做,也还不至于天马行空的"泛化"。在比较优秀的尝试者那里,我们看到或者透过小说分析发掘写作姿态背后的知识分子心态历程[3];或者考察文学"生产"中很重要却又往往被忽略的某些因素,包括读者市场、稿费制度、作者职业化、出版发行,等等[4];或者调用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探讨与作家风格形成相关的地域文化影响⑤;或者以女性主义的视觉解读作品;还有分析文学表达中的宗教文化心理,等等。无论"理论方法热"还是"文化热",都是 80 年代知识分子精神需求在学术上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正好符合学科复兴的趋向,有利于打破僵化的文学史思维。虽然这些"热"也受到诸多批评,似乎一阵喧哗之后又归于平静,但总还是有所收获,而且这些努力所形成的学术积累在 90 年代继续发生着作用。

四、文学史整体观与学术格局的探讨

1985 年还有另外一样重要的事情,就是"新文学研究整体观"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陈思和的《新文学研究中的整体观》⑥认为五四以来的文学被政治性的标准"拦腰截断"为"现代"与"当代"两段,都不能构成完整的整体。他提出打破以 1949 年为界的人为的鸿沟,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看作一个开放型的整体,从宏观上把握其内在的植视和发展规律"。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是强调整体把握,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单是把目前存在着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这样的研究格局打通,也不只

① 黄子平:《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叙事模式的抽样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 年第 3 期。
② 孟悦:《视觉问题与五四小说的现代化》,《文学评论》1986 年第 1 期。
③ 余凤高在八十年代发表系列关于现代文学心理分析的文章,后有专著《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④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
⑤ 如杨义的《文化冲突与审美选择》,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年版;陈继会的《理性的消长:中国乡土小说综论》,郑州中原农民出版社 1989 年版;还有吴福辉的《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论京派小说》,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87 年第 4 期,等等。
⑥ 载《复旦学报》1985 年第 3 期。后来陈思和写有一系列"整体研究"的论文,包括关于新文学前后三十年分为 3 个时段 6 个层次的划分(这显然受到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关于几代知识分子划分的影响),关于三大文学思潮的命运,关于当代意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提出一些颇有见地的观点。

是研究领域的扩大,而是要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5]文章从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总格局的关系,其所包含的民族意识、审美意识,以及作为语言艺术的形式演进等方面,初步论证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这两篇文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实此前早就有过关于近、现、当代文学的分期,以及打通现、当代,建立"现当代文学"完整的学科的讨论。① 所以陈思和特别是黄子平等人的文章发表,虽然也有不同的意见,比如认为"二十世纪"这种硬性的时间划分不能取替比较有弹性的"现当代",或者批评其对世纪文学总体特征的概括不够准确,但在"整体把握研究"这个基本观念上,多数人都是认同的,并没有很多异议。黄子平等人的文章引起对现当代文学分期和学科格局的热烈讨论,1986年9月甚至还专门召开过一次有关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当时的意见不太统一,有的赞成黄子平等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把近百年文学视为一个整体;有的主张把鸦片战争以来的近、现代文学合一,统称"近代文学";但更多的意见是接近王瑶的看法,即把1919年五四运动到1976年"文革"结束这一大段文学称为现代文学,而1976年以后的新时期文学应当是文学批评的范围,可不入史。② 尽管由于标准不一,分期的意见也各有道理,但80年代中期这些积极的探讨表明,文学史研究的"整体观念"已经逐步形成,并首先带动了对学科格局的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研究再次引发对于自身超越的强烈渴求。

80年代中期的学者变得那样成熟和自信。他们在历史提供的舞台上痛快而尽情地表演,比较充分地做完了当时条件下可以完成的工作。他们的思考与努力促使80年代后期诞生了一批可观的成果,包括当代文学研究成果。让我们粗略地巡礼,可以发现:如凌宇的《从边城走向世界》(1985)、杨义的三卷本《中国现代小说史》(1986、1988、1991年)、王富仁的《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1986年)、季红真的《文明与愚昧的冲突》(1986年)、洪子诚的《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1986年)、黄子平的《沉思老树的精灵》(1986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1987年)、刘纳的《论五四新文学》(1987年)、陈思和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1987年)、王永生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中卷 1986、1988年)、赵园的《论小说十家》(1987年)、朱栋霖的《论曹禺的戏剧创作》(1986年)、孙玉石的《面对历史的沉思: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回顾与评析》(1987年)、朱寨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1987年)、温儒敏的《新文学现实主义的流变》(1988年)、俞元桂的《中国现代散文史》(1988年)、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1988年)、蓝棣之的《正统的与异端的》(1988年)、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1988年)、曹文轩的《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1988年)、谢冕的《文学的绿色革命》(1988年)、贾植芳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1989年)、王锦厚的《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1989年)、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1989年),孟悦 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1989年)等等。③ 以上列举的是80年代后期出版影响较大的部分论著,还不包括那些单篇发表的出色的论文(例如在"重写文学史"倡议下产生的一些有创新意义的论文)。这个阶段如此集中地呈现一批有分量的成果,其实也是"文革"后十多年学术积淀的升华。这些作品和以往现代文学许多著作明显不同的地方,就是更加讲求学理性,也更表现出学术个性。说80年代后期是个丰收的季节,也并不是夸张。

不过,一方面有许多出色的论著问世,另一方面现代文学学科的处境又每况愈下:这是80年代后期的一种矛盾现象。把这一个十年的现代文学研究称为"显学",也并非自封,"文革"结束后,现代文学要清理废墟重建学科,那时真是社会瞩目的"大事"。现代文学研究因为贴近现实,一举一动都牵动大的反响。在80年代前期,文学仍然处于社会文化结构的中心,就如后来人们所形容的,

① 如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鲍昌在1985年"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报告就提出要注意把握现代和当代文学"具有系统论意义的整体性",建议建立完整的现当代文学学科。

② 有关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的纪要刊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同一期还有亦箫的《19至20世纪中国文学断代问题讨论综述》。

③ 这里所举的只是一部分影响较大的著作,所标示的时间是出版年份。其实还有一些未能例举的论文在当时也是很有影响的。

当时的文学包括现代文学史研究正和意识形态共度"蜜月期"。其实这也是很特殊的历史现象。曾几何时,到了 80 年代后期,"显学"的风光不再了。随着社会转型,市场经济越来越改变整个社会结构,昔日处于中心位置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了。① 这大概是不可抵挡的大势,甚至也可以说是有相当历史合理性的趋势。但对于现代文学学科的冲击无疑是相当大的。而且这种冲击在 80 年代后期只能说还刚刚开始,许多研究者当然不习惯,他们忧心忡忡,青年学者更是"六神无主",难于接受事实,很难静下心来做学问了。这种状况当然不利于学术,但客观上也在迫使现代文学研究调整心态与步伐,有可能过滤某些外加于学科的非学术性的东西,使学科的素质更加扎实而纯粹。

为此,在 1988 年 10 月,现代文学学会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联合召开第二次现代文学创新座谈会。② 这次会议主要是青年学者的交流,但与会者中有当时所谓四代学人的代表。大家都意识到现代文学面临的困境,有些属于大环境的变化是不可抵挡的,关键是学科本身要以积极求实的姿态面对挑战。与会者普遍认识到现代文学过去曾经有过的"中心位置"和轰动效应不会再现,学科已经进入"日常的学术建设阶段";现代文学学者要正视改变中的现实,克服浮躁,还必须"消肿",沉下来扎扎实实耕耘积累;大家认为学科全面创新突破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这一些都有待今后的加倍努力。应当说,这次会议最能反映 80 年代后期现代文学学者普遍的心态,尽管有了危机感,却还未敢懈怠。有些青年学者甚至还重新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肩负起继往开来的学术使命。可惜不久就发生了八九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整个社会发展的节奏忽然被打乱了,许多学者的心态与学术计划也打乱了,现代文学研究再一次陷入低潮与困境。直到好多年之后,学术生产的元气才缓慢地恢复过来。

参 考 文 献:

[1] 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2] 林兴宅.论阿 Q 性格系统[J].鲁迅研究,1984,(1).

[3] 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4]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5] 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J].文学评论,1985,(5).

A Review of the Modern Literary Studies in the 1980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isciplinary History

WEN Ru-m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In the 1980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was a glamour field in humanities, which had made a good harvest. This paper makes, from the viewpoint of disciplinary history, a review of its reassessment and resuscitation, trends and intellectual schools, methodology and theory "craze", debates on the limits and phases of this discipline, as well as some important phenomena in various stages of "Rewriting Literary History" Movement, discussing for what those academic trends sprung. This paper traces the process of modern literary research from a prized catch to common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retrospects the gains and losses of the discipline in question.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Disciplinary History; Academic Trends;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责任编辑　何　方)

① 有一个事例很说明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79 年创刊号的发行量是 3 万册,1980 年每期的发行量平均也有 2 万册,到 1988 年就降为 3 千册左右。

②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综述《学科召唤新一代的崛起》(谢伟民),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 年第 1 期。